

石层，学生个个面黄肌瘦。在阜新煤矿，看到学生在煤层中钻煤，煤尘四起，呼吸困难；在辽阳制麻袋厂，看到学生在尘埃中劳作；在辽阳制火药厂，看到学生有中毒的现象，许多人头痛。据推算，学生因勤劳奉公，疾病死亡率在5%。”卢元善对积极地推行伪满洲国的战时体制教育，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。

伪满洲国垮台后，卢元善作为出卖祖国民族利益，助纣为虐的汉奸，在长春被苏联红军逮捕，押往苏联。1950年7月被返遣回国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病死。

（摘自《伪皇宫陈列馆文集》1991年）

## 伪交通部大臣丁鉴修

安国政

丁鉴修字韩元，生于辽宁省盖平县万家岭。民国初期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系。归国后，初期任日语教师，1920年前后，张作霖统治东北时，任东三省交涉署顾问、奉天省财政厅顾问、奉天省公署咨议、中日合办弓长岭铁矿公司中国副总办（日侧总办是野口），这些差事一直继续到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。

丁鉴修这个亲日派，据说张作霖平时并不重用他，一般高级文武官员也不重视他。惟当时奉天省长兼财政厅长王永江对他有些庇护，所以他才能苟延残喘地保持着顾问咨议等无关重要的职位。至于弓长岭铁矿公司总办一席（月薪600元金票，是日币），待遇还很优厚，这完全是日方的力量使他久居此席，这些差事都是闲散不用上班，只白拿钱的职务。平时是这样闲散，

但每和日本发生交涉，就需要他出头向日方折冲，比较小的争端总能顺利解决，所以对日有接触时，还能得到张作霖的赐育。奉直战争时张作霖由日方购进军火，都是他从中斡旋的，日军火商总是予以相当的报酬，张作霖对他也有所表示，以谢其劳，因此他也借此发过大财。他善于交接日本人，一次他求奉天省长王永江写了数百幅字画（都是几个字的对联裱现成的）落上日本朝野有名人士的上款，由他发送，很受欢迎。所以他的日本上层朋友很多。和他至契的也不乏其人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以前，他在沈阳的住宅光是客厅就有五大间，装饰华丽陈设惊人。经常来访的客人中，日本人占绝大多数，日本来东北的参观团、视察团等，差不多都到他家访问，他也在家经常设宴招待来访的日本人。他个人经常乘自用汽车去日本领事馆和“满铁公所”，他每次外出十之七八是访日本友人，日本高级酒馆的交际场所，都有他的足迹。张作霖的日人顾问如菊池武夫少将（后升中将）、町野武马大佐等都与他至契，町野大佐称他为“丁盟兄”，可见其关系之切。秦真次少将以考察中国风习为名，穿着中国衣服竟在他家住了半年，和他共同食宿，甚至成了他家族的一员。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和他的私人通信差不多每天都有，他还广订日本书报杂志，因此日本消息十分灵通，由此可知他是如何倾心日本的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当时，他和张景惠、阎朝玺、袁金铠、赵欣伯等人大肆活动，媚合敌意，组织自治维持委员会，安抚民众，亲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兼沈海铁路局长。1932年春，伪满莫都长春，他全家也由沈迁长，任伪国务院交通总长。同年五六月间，国际联盟调查团来长，曾来伪交通部访问了他，作了长时间的会谈。丁鉴修再三强调，“满洲国是基于3 000万民众独立自主的热望而产生的”，替日本的罪恶作了辩护。此后不

久，在6月下旬，他以满洲国国民访日代表团特使的资格，出访日本，向日朝野谢恩，敦请承认满洲国的独立。在日本10天期间，他先后参拜了天皇皇宫、明治神宫和靖国神社，访问了日本首相和陆军、海军、内务、外交、司法、大藏等省大臣，以及各财团首脑与主要新闻社，并对日本民众进行了多次讲演，用他的奴颜卑膝的亲日行动，完成了向日本朝野谢恩和敦促日本承认伪满傀儡政府等两项任务，亦即完成了假国民运动的任务。

伪康德元年（1934年）3月1日伪满改为帝制，丁鉴修改任伪交通部大臣，在任期间曾往哈尔滨接收中东铁路，代表伪满洲国完成签字仪式。1936年前后，转任伪实业部大臣，出席过在东京召开的“日清华经济恳谈会”，后由伪实业部大臣转任满洲电业会社社长，这时已不如意，他自己曾说过：“丢官罢职”。最后离开电业会社，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。环境更不如前，这时他几个儿子和两个姨太太都不在身旁，以监督儿子读书为名分住南京和北京。以至朱门冷落，倍感萧条，和盛极一时的当年豪宾贵客车马盈门的时代则有天壤之别，竟于1942年夏，由于被一女人控诉，积郁成疾而死。

在他最后任伪参议府参议时期，他曾说过：没有比参议这个事儿再自在的了。每月开一两次参议府会议，武部的提案没有不通过的，只是走走形式就等于“参议府会议通过”了。参议府好有一比，参议府就是个窑子（妓院），参议就是个条子（妓女），哪叫都得去（就是说一切重要场面都找参议出席）。晚年他很好说类似这样的讽刺话，充分表现了他“丢官罢职”时的不满情绪。

世人尽知，丁鉴修在生活上，专门“寻花问柳”，九·一八事变前，纳入家中的就有四个姨太太，在外私通的女人也很多，其中包括日本及白俄女人。汽车往往长时间停在私娼门前，给

他开车的姜某说：“连开车的都跟他丢人！”最后控诉他的莽姓女人（绰号大莽）颇有姿色，这个女人原是交通部邮务司长藤原的心爱，和藤原同栖数年，藤原归国后，丁便接过来，在外另立门户，并生了小孩。后因该女见丁老衰，迫丁分与财产，因要求数目过巨，丁未允，乃控诸法院，丁因此大伤脑筋，积虑成疾。丁任大臣后，因在长春头道沟（这时还是日本附属地）越香春旅馆，调戏女人，被日本巡捕打了耳光，结果出了伪币200元谢之，该女许为守秘乃了事。在他作为代表满洲国民访日特使访问广岛时，曾在旅舍要求女招待陪寝，被该女婉言拒绝，丁乃特记其姓名，归满后，仍是恋恋不忘，令其日人秘书仲本为该女写信要求来满，也被谢绝。他任伪交通部大臣时，曾去哈尔滨视察邮务，在邮政管理局职员水某家，看中了水妻姿色，水某素知丁的好色故特以妻色诱之，以谋升进途径，后丁任电业社长时竟将水某由哈调来，以400元的月俸任以电业社长秘书之职，丁遂得与其妻幽会之机。又一次他的内弟郭某携新妻去丁宅访拜，丁特令郭某外出为其办事，丁乘隙将郭妻诱进浴室行奸，被他上街归来的二姨太太发现了丑行，在浴室内打了丁的耳光数个。郭某获知此事，暗骂其兽行，永不再去姐夫家拜访了。类似这样事情在他平生数十年中实不为奇。

丁鉴修的生活方式无论在旧中国或伪满，一贯是豪奢的，尤其在色情方面，不惜千金以求之。另外喜古董书画，不辨真伪总以高价网罗，许多古董商人，经常出入他的宅门，因以致富者大有人在。在伪满首都新京，竟以7.5万元的巨款，由日本著名土木工程界的大林组特为设计，修筑一座富丽堂皇的三层花园洋房，庭园分为动、植物两园，饲有猴、犬、奇鱼之类的动物。雇用日人长谷川某为饲犬员，其犬是系购自德国的奇犬，每日食牛肉5公斤。所用手杖价值百元以上者有百余根。英国伦敦

制的烟斗常用的不下50个。喜写应酬字画，日人多求之，总是有求必应。关东军上自司令官、参谋长，下至尉、校级，无其笔墨者无几。宅中有宽敞的书斋一室，名砚陈设满斋，藏有日本名画数百轴，室内设有喷水鱼池。大、中、小客厅的陈设流行，生活的豪奢，在伪大臣中也是罕见的。但对雇佣人员非常苛薄，鄙视劳动人民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，在沈阳宽大的自宅前，常有行商售货，颇为他姨太太们称便，但丁在家时行商则不敢停在他的门前，恐遭打骂，总是乘他外出之机前来售货，但一闻汽车归来鸣笛声音，都会仓皇逃避，来不及者则遭其拳打脚踢。在任伪满交通部大臣时，部内20余名工友，因工资低，生活困难，联名向其请愿增薪，丁不但未允，反而大发雷霆之怒，下条子命令人事科长予以一律开除，经人事科长再三说情始行了事。他积累财富很多，伪满大会社的股票他持有数千股，北满乌吉密河地区有大片土地，盖平故里有大果树园，他的儿子亦各有洋房，在伪交通部大臣任中，除固定月俸1300元外，每年还有满铁的赠与金数万元。

丁在伪满时被称为建国元勋，伪满初、中期时是他最得意时代，在任伪实业部大臣期间，为他父亲治理丧事，举动之大，不可一世。日本朝野的吊电，不下百件，关东军及伪满首脑以及其他各界送的花圈，在出殡时排列了数里之长。一时盛传他将继任张景惠国务总理之职。后期虽然萧条，但他的声望还是不小，一次他自己吐露过，日本某要人邀请他出马赴重庆见蒋介石说和中日妥协问题，他拒绝了，并说：“我去得把头颅丢在重庆！”

丁的一生完全是靠亲日而起家的，晚年因“丢官罢职”，被疏远，益不得逞汉奸之大志，加上莽女的控诉大丢其脸，抑郁而死。死后伪满当局为他挂一辆高级灵柩车，外侧用大幅白布

墨书：“前交通部大臣丁鉴修阁下之灵柩”，一路开往盖平，沿途各站，多有日人致吊礼哭泣其侧者。

大汉奸丁鉴修的一生，竭力为日本侵略者尽瘁，贡献很大，所以日本朝野对他是异常亲切的。死后还能感泣日人，可见他的亲日程度之深。

## 我的傀儡生涯

黄富俊

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时，我被伪民政部次长葆康邀至长春，举荐我当了地方司司长。到任后发现，整天有宪兵来回巡逻，令人心神不安，工作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心里很不舒服，但又没有办法。几天后地方司组织机构正式建立，司内设总务、行政、财务、社会四个科，其中除行政科长是中国人外，其余三个科的科长都是日本人，我虽是司长，也要听他们的。记得我到任不久，要召集各科科长和事务官会议，研究、布置各科应进行的工作。可是通知刚下，总务科长都甲（日本人）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：“司内应办事项，应由总务科长向各科布置拟办，司长只总其大成，不必出席开会。请您相信我好了，我要有不明白的地方，再向您请教，求您指示。”刚着手工作就被这软中带硬的手段给压下去了，自此以后，我无法再行使别的职权，只有在文件上盖章。有时部里的总务司召开关于行政事务会议时，邀我出席，但因全用日语，而我又不懂，只好靠翻译向我译个大概，当然就更没有发言的机会了。只有当总务司长问到我的意见时，我才能表达一下，但我心里明白，这不过是走走形式，